

一
大
人

四川主金誠恐怖与

劉湘東下

四川之金融恐怖與劉湘東下

張禹九

今日川局之緊張，以財政金融為主因；而財政金融之緊張，又以重慶一埠為主體。○目前重慶之金融實況，如一患貧血之人，其日升不降之熱度，厥為吾人憂灼之焦點。○當局之「辦法」殆盡，及人民缺乏整個之認識，以是全市商民，遂如置身沸釜之中，其恐怖程度更臻亂情形，實為世界各埠所罕見者也。

重慶之金融，正如一稚弱之嬰孩，何能經受長時期之「高熱度」，而四川軍政情勢之嚴重，有賴於重慶之金融者尤多，又豈能漠然不顧而聽其夭折耶？

重慶金融之病勢如是，茲試診視其病象為何：

(A) 金融之恐怖

(一) 申匯之狂漲：重慶申匯從本年七月份之最高行市一九九元，至八月份之一三三八元，九月份之一五〇五元，而達十月份之一六四〇元，每一川洋竟低至僅值渴

洋六角，或僅合美金二角。

申匯高漲之結果，除可使進口貨量減少外，似不應有何惡劣影響，但因匯出匯款之擁擠，投機「做空」之過份，致造成「票荒」之恐怖。暨交易所在漲風日甚之下，依令停拍，「空頭」因急欲補進，尤不惜以高價交換，因此申匯愈漲，「票荒」亦愈甚。其不明金融事業者，方以爲某某行莊，或某某個人，手握「多頭」，有意操縱，置市面於不顧。及十月廿三日申匯高漲至卽期一四九八元時，是日午後某一行莊賣出八九十一萬元，其行市不惟不跌，反由一五〇七元升至一五二五元。由是昔日以高調或手腕斥責「多頭」者，至是乃大釋其疑矣。

(二)洋水之高翔：(洋水者劃賬洋對於現洋補水之名詞)洋水之最高紀錄，厥在本年最近之十月份中，每千元貼水由十月一日之九十二元，漲至十月卅一日之一五〇元。洋水既漲，現金愈覺名貴，發行銀行對於準備，愈求充實；支票與莊票之流通，更加膨脹；商家之往來，因「賬銀」與現銀價格之大相懸殊，愈感不利，而洋水之高翔

，影響及於申匯之上漲，亦愈顯著，申匯愈高，私運現洋出川者亦愈活躍；凡此種種，使「金融之安全」，發生恐懼；而人民因恐怖心理之轉濃，使匯出匯款愈多；洋水申匯，遂愈狂漲而幾至不可收拾。因果相生，乃促成此恐怖之局面。

(B) 市面之紊亂

市面之紊亂情形，其表現於商業者如左：

(一) 因洋水之高漲，使一般人民購買物品，亦多避免現金之使用，致市面發現許多小至一二元之小額保付支票及遠期莊票。由是貨物價格亦隨之高漲，或暗中發生現銀與「帳銀」之兩種價格。

(二) 因申匯之高漲，而進口貨物減少，又因市場不景氣，致銷路狹窄，即有銷路，不易收得現金，縱能收得現金，大半銀行又不收存款，并匯款復受限制；於是商號乃有不惜於雙重稅繳之下，將原貨件轉運上海售賣之舉。蓋此舉尚可得匯水之餘利，復獲「資金之安全」也。

(三)申匯高漲，果可使出口貨增加。查重慶出口貨，計八九十三個月估計約值洋五百萬元。計拋售後可得之資金，設能悉數調回，農村經濟，自可稍舒，購買力亦當稍增。循此而論，進口貿易亦當稍有起色，稅收亦可稍旺。但考諸事實，則恰相反。查八九十三月已經調回之款，估計不過全數二分之一，推測其原因則不外乎：

①出口貨運出過多，申價低落，存貨擁擠，不易競售。

②重慶利率本年十月初低至三厘，殆與上海銀拆相若。

③現金枯竭，往來悉爲「帳銀」，致減削商人對於「金融堅固」之信仰。

④銀行錢莊有不收存款者，資金安置，在在困難。

(四)近來渝市商業情形，消沉達於極點，獨「批發」交易尙屬活躍，蓋有人壅於：

①接帳洋之膨脹，

②銀行錢莊之限制收受存款，

③申匯高漲及匯出之艱難，

④銀行錢莊目前給與人民不甚堅定之感想，

於是爭相囤積貨品，以銀易貨。如近日市面，駝絨缺貨，即屬有人大事購囤之小小明證；至於一般商號門市生意，亦尚有微利可圖。惟非因其爲夏季匯水低時之來貨，（其實市面清淡，始終並不敢提價。）而其所得者乃爲「洋水」之利耳。

(五)出口洋商，如美孚，亞細亞，銷售煤油，因申匯之漲，「帳銀」之跌，洋水之高，及川洋對人頭洋之補水，遂設法將煤油根據重慶之人頭洋申匯行市定價。并要求以人頭洋付給。唯爲鼓勵經理人起見，每千元補助一百八十元之申票匯水。由該項洋商與銀行來往，須開立三種貨幣之戶頭：一爲撥帳洋戶，二爲川洋戶，三爲人洋戶。

復次，市面之紊亂情形，其表現於金融業者如左：

「四川商業蕭條，銀錢業獨呈繁榮。」此爲盡人皆知者。然銀錢業雖以前會有享受厚利之機會，及在金融界佔有相當之地位。惟時至今日，反居「近退維谷」之地位，并造成「半身不遂」之現象。其故維何？即

①商務蕭條，利率低降，投機風熾，致商業放款不易。

②政府財政日蹙，「套搭抵借」過甚，雖仍厚利所在，官廳放款，未敢再增。

③現金乾涸，紙幣充斥，「撥帳洋」過量膨脹，申匯奇漲，公單過多，於是銀行停止收受存款，限制承匯匯款。

此停滯之現象，在銀錢業固有不得已之苦衷。然社會上普遍之感受不便，則又為何如耶？

夫重慶之金融，以上海為樞紐，川省之金融，則以重慶為樞紐。因重慶申匯及洋水之高漲，省内之洋水日增，渝匯日落。其情狀略如下表：

地別	八月			九月			十月		
	渝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	申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	渝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	渝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	申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	渝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	渝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	申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	渝 匯 一 千 沙 市 水 等 千 金
萬縣	九七五	五五	九七二	九七二	五五	八五六	一〇〇	一一〇	一二〇
成都	九五五	〇	八五〇	八五〇	〇	六九〇	八五〇	八五〇	八五〇
內江	一〇一七	一五	九三〇	九三〇	二〇	八八八	一五	二〇	四〇
敍府	九九五	一〇	八九〇	八九〇	〇	八五〇	一一〇	一一〇	一一〇
嘉定	九九五	一〇	九六〇	九六〇	一〇	八五〇	一一〇	一一〇	一一〇

其理由則概括如次：

(一) 省內各地認為重慶市場「是軟的」，其故由於渝市「信用工具」之過量膨脹，乃紛紛調款，致各地渝票，價均慘落。

(二) 稅收機關，及官方銀行收集渝鈔，現洋及銀錠陸續運渝，(往日係購買渝票)以作兌現，「賣水」，集現，改鑄之用。由是各地之大洋渝鈔均須貼水，而半元，毫洋亦漸枯竭。

(三) 內地渝鈔流通，本與現洋無異，旋因硬幣之缺乏，而一面又以渝市金融之可懼，致渝匯大跌，反造成渝鈔貼水之現象。

設若重慶金融之種種現狀，不加改進，恐怖之心理不減，紊亂之局面不平，則省內金融當愈趨緊張；省內金融愈趨緊張，重慶金融當愈增恐怖。換言之，財政也，商業也，銀行也，發行也，凡此種種，均有密切之關聯，不能僅以「一端」「一方」之成功，或一埠一家之繁榮，為服務金融事業之準則也。

重慶之金融恐怖，其病態歷已往一二月之經過，已有察及癥結所在之人矣。咸謂申匯之狂漲，洋水之高翔，利息之低落，銀錢業之停滯，資本安全之恐懼，皆有同一之病源，即緣於政府之濫用公庫及公庫公單發行額之過甚是也。

湖公庫之成立，由於昔日渝市收交餘額之不能取現，始有此「銀行之銀行」之設置。其成立期為民二十二年五月，創設之初，尚能勉照初旨辦理。不三月值當局財政短絀，乃商諸各行莊以證券等向公庫抵押轉貸，是為公庫與財政當局發生關係之起點。嗣後繼續倣行，公單之發行額日增，市面之「信用工具」日益膨脹，致失却其與現金之比例。結果距公庫成立不五月，收交餘額，即悉不能取現，而公庫之公單，遂從此「軟化」矣。

當局此時則又以軍費之不敷，市面借貸之額滿，遂復以未經銷售之公債庫券，續向各行莊轉向公庫抵借公單。其數額由三十萬元而達八百萬元。此八百萬元之公單，

即今日重慶金融恐怖之大動力也。

茲進而言曰：「川局之緊張在財政，財政之緊張在重慶之金融，而重慶金融之緊張，乃在公單耳。」

今日之財政當軸，行莊領袖及全市商民，無不祈早日祛退此金融病之「高熱」，而其唯一之處方，則僅有減少公單，或取消公單之一法。然以目前稅收之減色，公債債務之必須顧全，短期貼借之必須償付，兵卒餉糈之必須支撥，又將何所挹注以取消或減少發行公單之額度耶？

夫政府之利用公單，緣由財政款項之不敷，然則廿一軍之財政借款，究屬至何田地，而致竟能發生金融上之恐怖？此吾人在意欲解決公單問題之先，又不能不一致廿一軍財政之大概也。

查廿一軍財政，除田賦稅收之外，不足之數，又藉發行公債以供支拂，所發之數

，前後共計一二五，〇〇〇，〇〇〇元。計至目前止，公債本息所欠餘額約四五千萬元。溯自民廿一年開始發行以來，公債庫券，信用昭然。蓋發行既有稅收的款，作為擔保；本金利息，又復按時償付；而學校團體，孤兒寡婦，儲蓄銀行，仰恃於公債之投資者，其關係尤鉅而且深，宜其信用之不容忽視也。

因公債信用之必須顧全，而財政之收入，則時感拮据，乃復利用各種手腕，向市面短借巨數。計至廿三年十月底，未清結者，尙有

(一) 鄭汝百期票 一〇，八〇〇，〇〇〇元

(二) 短期借款 四，六〇〇，〇〇〇元

(三) 公庫公單 八，二五〇，〇〇〇元

即以上列三項合計，已達二三，〇〇〇，〇〇〇元。綜言之，廿一軍之長期，短期，有抵押及無抵押借款，共計約六七千萬元。若再加入欠飼，聞有八九百萬元之數，則廿一軍之債務，總計約為七八千萬元。

然以四川之地大物博，人口六七千萬，以此約七八千萬元之債款，似不可謂已達於十分不能支持，及困於週轉之地步，此爲吾金融界同人所洞悉之事實。惟夷攷其實，則當局偏重於增加人民之經濟負擔，而忽略於栽培人民之生產能力；軍財政費日益擴充，民富增加之日益艱難；派整籌募之巨而且迫，負擔恢復速度之細而且緩；此皆釀成今日金融恐怖原因之所由來也。

茲查廿一軍財政之支出方面，計目前每月

(一)軍費	三，六〇〇，〇〇〇元
(二)行財政費	三〇〇，〇〇〇元
(三)公債本息	二，〇〇〇，〇〇〇元
(四)勦赤費	五〇〇，〇〇〇元
共計	六，四〇〇，〇〇〇元
每年總計	七六，八〇〇，〇〇〇元

若再加入二三，〇〇〇，〇〇〇元短借之息金，以最低年息二分計，則每年支出再加四百六十萬元。由是廿一軍全年之支出，總數當在八千一百四十萬元以上，而全體收入，每月僅在四百五十萬元左右，全年不過五千五百萬元。

支出數目之巨，恐爲上述恐怖由來之一原因，然吾人若研求其在最近三年中公債發行及籌款之速度，則當恍然另有所得。

年 度	公債庫券發行總額	債 額	每 筆 發 行 額
		最 低 額	最 高 額
民國廿一年	一千三百萬元	三千餘萬元	一百萬元
民國廿二年	一千八百五十萬元	五千餘萬元	二百五十萬元
民國廿三年	三千四百萬至七千四百萬	七千萬元	五百萬元
		三百萬元	一千五百萬元 至四千萬元

吾人姑不論今日因財政之窘迫，造成金融之恐怖，其未來如何。即以民國十六年六月之金融風潮作一引證：是時廿一軍部負債全額，共約四百餘萬元，卒以「有財不

理」，「有財無政」，而演成鈞益公之事變。蓋自民國十五年以前，軍方之籌募，祇在軍隊開拔或敗退之際，且每次要求最高額不出百數十萬元，但至民國十五年後，於一二年期之中，竟將市面之借款，增加殆與當時二十一軍一年收入全部之總額相等。故今日財政之窘迫，而造成今日之金融恐怖者，實緣於增加人民負擔的速度之過重也。

吾人進而查四川財政之「處置」。其「辦法」，簡言之，可以下列程序解釋：

(一) 紳商派釐：紳商顯然為都市之資產階級，遂經商會機關之組織向其派釐。

(二) 田糧預徵：紳商範圍較狹，遂按田糧額度，而向農民預征若干年。

(三) 百貨加稅：紳商階級力竭，田糧預征過頻，遂向進出口貨件，創以各種名目
，加徵稅額。

(四) 公債發行：關卡稅捐加徵過重，遂以未來之稅收，作擔保而發行公債。先向商場派售，旋向商場押借，再進而向商場拋售。

(五) 期票短借：公債換來之資金，不能應付入不敷出，散漫之財政，由是遂以各

種期票，向市場短借。由最繁榮之鹽幫，而達土幫，鹽土兩幫期票不敷用，而復以總金庫之名義，自出期票給予各部隊軍需，持向商場貼借；嗣又因總金庫之期票過多，乃由總金庫經理個人署名，可添一重保障之期票，向市場活動。

(六)鈔票抵押：期票之「套搭移補」費手，有時遂以官方金融機關發行之鈔票，向銀錢業抵押短借。

(七)『通貨膨漲』：糧契稅券發行額之不敷防區擴大後之流通，官方遂又成立銀行，致力於鈔票之發行，庶準備可銷納百分之四十之公債，而資活動，藉紓財困。

(八)借用公單：政府之借貸方法及能力殆盡，遂又利用銀錢業之「信用交易工具」——公單，而吸用全市之餘資。

就上述而言，其遞嬗之始末，似予吾人下列各種所謂理財之意義或哲理：

(一)由軍而商：從無條件之強徵硬派，而達於信用契約之行爲。

(二)由狹而廣：從注目於一幫或一階級，而達於社會普通之一般。

(三)由短而長：從短期臨時之貼借，而達於最長時限期之債借。

(四)由公而私：從以機關之名義，而達於個人之手腕。

(五)由實而虛：從有稅款確實擔保之債券，而達於純粹信用的挪用。

(六)由財政而金融：從財政範圍，而達於金融之中心。

由此觀之，廿一軍之財政當局，其苦心孤詣之成績，及其「無所不用其極」之方法，可謂周至矣。然今日八百萬之公單，又何能使重慶之金融，產生長時期之緊張，及令人心寒之恐怖，其中癥結，決非從前債額之後，而不能再增加此八百萬元之負累；決非財政數字上之關鍵，而爲財政平素之設施；又決非財政之方法，而實爲財政之背景也。

試以重慶之金融業而考察其境況如何？其與財政之關係，又為何如耶？

查重慶一埠現有銀行共十二家，除中國銀行為上海總行之分行外，餘皆為本地組織。其資本小至三十萬元，大至一百二十五萬元，總額為八百一十萬元，此十二家中除中國，聚興誠，美豐之外，皆產生在民國十七年以後，信用歷史，均屬淺短。

至於錢莊，則重慶全市共有十八家，資本小者四萬元，大者二十七萬七千元。其中七家開設於民十六年之前，而於民十九以後成立者，有十一家。

重慶之銀行錢莊共計有三十家，其中於民十七年以後始設立者，占三分之二，共二十家。兩業資本總額共計不過一千萬元。而其有軍政人物之資本關係者，約在十分之八以上。

重慶商務之蕭條，銀行錢莊之盛行，成立歷史之短淺，資本之小，已如上述。然則吾人再一考察其營業之大概，又為何如耶？茲有銀行前輩估計告曰：

(一) 銀行

(一)資本：八百一十萬元。

(二)存款：三千萬元。

(三)發行：發行銀行有六家，其中四川地方銀行為最大之發行銀行，計發一千五百萬元外，餘共計約四百萬元。(糧契稅券為總金庫所發，計有五百五十萬元，不計在內。)

(四)負債：以重慶十二家銀行之資本，存款，及鈔票而言，其負債總額共計約為五千七百萬元。

(五)放款：共約四千六百萬元。軍政約計三千二百萬元。商業約計一千四百萬元。

(六)庫存：全市銀行庫存，包括發行準備現金共約在一千一百萬元左右。

(七)資產：重慶十二家銀行之放款及庫存，合計約為五千七百萬元。

(八)資負：資產總額負債總額均約計五千七百萬元。

(二) 錢莊

(一) 資本：一百九十萬元。

(二) 存款：一千萬元。

(三) 負債：一千一百九十九萬元。

(四) 放款：一千一百萬元。軍政七百五十萬元，商業四百五十萬元。

(五) 庫存：五十萬元。

(六) 資產：重慶十八家錢莊之放款及庫存合計，約為一千二百五十萬元。

(七) 資負：資產總額約計一千二百五十萬元，而負債總額約計一千二百萬元。

茲計其百分率如下：

銀行之軍政放款，約佔其全部資產百分之五十六。錢莊之軍政放款，約佔其全部資產百分之六十。銀行與錢莊其軍政放款之比較，計銀行佔百分之八十一，而錢莊則佔百分之十九。

查棉紗布疋爲四川進口之一二大宗貨品，亦爲測量農村經濟盛衰之最好標準。民十三四五年時，棉紗進口輒在十六萬包左右，而今不過十四餘萬包。比較觀之，似無巨大之減削，殊不知在十三四五年時，四川布疋進口，輒在二萬五千件左右，而以內地織布機房漸多，將進口棉紗，自行織製，故疋頭進口已減至一萬件餘而已。

再試觀民十三四年時之航業，當洪水時期，大船爲福同，福源，蜀亨，彝陵，等輪，時常行駛於敍府上海之間；棉紗水腳今昔相差，幾近五倍，藥材花鹽，昔日視爲「粗貨」，今則各船公司，即欲「搶裝」而不可得，更有何水腳高低之可論耶？航業運輸爲民富，繁榮，進步，稅收之脈息，社會經濟之寒暑表，吾人試引證而推論之，舉隅以反三，卽思過半矣。

以是關心經濟者，試就篇首敍述之各種狀態，如申匯及洋水之空前狂漲，渝票之慘跌，以及其他奇異之紊亂情形，莫不謂今日四川之民富，已日減削，農村經濟，殆已崩潰；都市繁榮，亦已退減；省内資本，外流殆盡；工商產業，衰敗已極，而金融

事業，亦復徒有其浮華耳。總言之，四川貧窮之暴露，乃爲今日財政之背景也。

故與其曰「川局之緊張在財政，財政之緊張在重慶之金融，重慶金融之緊張在公單，公單之緊張在財政之方法」，不如謂川局之緊張在財政，財政之緊張在重慶之金融，重慶金融之緊張在公單，公單之緊張在財政之方法，而財政方法之緊張在財政之背景耳」。

茲如謂今日四川之財政金融之恐怖，憑此解剖，與夫邊輯之追索，有何補救於此緊張鼎沸的局面耶？誠如斯也，夫今日之財政當局，金融社會，莫不亟欲有何種有形之物質援助，不費一臂之力之方法，致如何使此八百餘萬元之公單，頓然沉沒於帳面，消失於市上，我輩身居金融漩渦中人，期望常更深而切也。

關於此次金融恐怖之發生，軍政當局與金融界，愁慮已久，彼此磋商，亦已多日。無如軍政當局與財務當局之南轅北轍，時而各持意氣，互相鑿枘；而財務當局與金

融界人，復僅表面周旋，各自爲計；而金融界本身，亦又多相疑忌，各持異見：有主張糾正政府之「權威派」，有不惜崩潰之「逃亡派」；有靜待圖利之「市倉派」；有我行我素之「超然派」，故雖經多方面之操心設計，而各有襟懷，結果無有所成也。

幸自九月以來，此次之緊張局面，始以財政當局之「莫有辦法」，中以金融領袖之熱心奔走，而卒以劉雨澄氏之由於飛渝，經一度之會談，便將此八百餘萬元之公單，向金融業短借渝洋四百萬元，申洋三百萬元，得暫救濟；至於此項借款，則以擬請中央代發之鹽稅公債爲擔保，當此會談結果宣佈之前一日，申匯即由一六二〇元暴跌至一四八〇元；洋水亦由一六二元而降至一五二元。重慶金融病症之「熱度」，似乎已有減退之象徵，而病體之血脈，亦似稍有來蘇之朕兆矣。

夫鹽稅公債之發行，其未來，其希望，其結果，吾人姑不以消極之態度而推論之。逆料鑒於四川今日在中國之地位，及其一切陷於不可終日之地步，中央斷無予以坐視，而不謀救濟之方者。又觀乎四川局面嚴重之認識，及劉督辦擬親自東下，與中央

作進一步之合作，則中央又豈有不以川局目前之嚴重，及劉氏年來奮鬥之困難，而不予以切實之援助。故吾人以爲鹽稅公債之未來，其金額爲二千萬，三千萬，五千萬，抑七千萬，雖不敢必，然其發行之實現，吾人或可無疑而預期其成。

但吾人細察四川今日之環境，其經濟之貧乏，已如上述。而其常前之赤匪問題，又將何以處置耶？抑思中央對於剿赤，以堅忍之意志，精選之人材，全國之財力，五年之時期，方能成功八九於今日。但數十萬之赤匪，雖大多數已經殲除，然現被驅逐出贛者，聞尚有八九萬之衆，又豈能謂完全消滅耶。

今則江西之赤匪，原曾竄入福建，擬聯海盜，但遭失敗，乃復企圖西來。蕭克一殷，山湘竄黔，即爲擇路前驅。貴州一省，民窮政亡，萬不能感受赤匪之誘惑於萬一；即如川北之赤匪，經將逾年之圍擊，猶未能滅其威勢，而或反增其實力。故今後之四川，若在川南須抵禦江西竄來之匪衆，而在川北則并須攻擊原有之匪衆，其未來之肩責，實不可輕視，而財政之前途，豈能仍以「比期軍需」之習慣，責此責彼之佈告，

市謠造成之命令，疑東忌西之態度，及「情面」「幫忙」之方法，所可處置者耶？四川今日以後之局面，吾人以爲非劉氏東下，與中央商討切實合作之辦法不可。而四川之未來，四川之治平，可以斷言決非四川一省之人『財』所能應付者也。故目下四川財政金蠅之恐怖，是否能以二、三、五、七千萬之公債，卽能澈底治療其病症，此又爲關心川局，愛護四川者之所欲求「信服」之要素也。

就今日四川之一般軍政人員而言，其沉溺於聲色，薰心於利祿，染不良之嗜好，逞唯己之私欲者，誠較國內任何一省爲多，而苦難有良好之批判。然如劉氏個人之刻苦堅厲，極思有爲，屏嗜好，無私財，超然卓立，十餘年來如一日，洵屬今日中國省治人物中之矯矯者也。吾人於劉氏愛之深，佩之深，而對其期望亦深。故如足蹟從未離川之劉氏，於其此次東下，切望其於進行之初，抱「商榷」之態度，以示地方與中央素爲一體，而避免成爲「交涉」之談判，顯露存有秦越之心理。立言不僅爲單純之「請

求」，務含「互助」之精神，而對於川省年來艱難混亂之實情，作毫無掩飾之敍述。進行之際，首以開發整個的國富為前提，而以財貨之挹注為末節；不僅以「有辦法」為畢事，而以廣集人材為先務。尤要者，則為返川之後，不僅謀畫軍政技術上之增進，而競業於公務道德上之培養。夫四川今日之需要，不在外來金錢之接濟，而在一切信用之樹立。蓋軍、政、財、商，之信用有，庶人材得以萃集，人材備，庶資金可以輸入；資金豐，庶百業可以繁榮，繁榮有，庶金融賴以堅定；金融安，庶財政因以寬裕；財政裕，庶軍政仗以安定；軍政一能安定，則所謂今日川局之緊張，自可有弛復之希望矣。

#58

112.324